

以質量兩軸觀點淺探我國體育學術研究脈絡

陳世恩

一、前言

科學認知已不是唯一普世承認的客觀標準，而多元文化主義流行，亦有墮入相對主義的危險，如何能夠不落兩邊，方是難能可貴。誠如眾知，中國近代體育是「舶來品」，其引進與推廣，歷經崎嶇，亦為大家所耳熟能詳，匡於台灣教育重智主義(intellectualism)下，近代台灣體育學術研究氛圍，也難定其名位。而根據哈伯瑪斯的說法，體育學術研究當不致囿於所指涉的三種旨趣，即：一.技術旨趣(technical interest)；二.實踐旨趣(practical interest)；三.解放旨趣(emancipator interest)。因其所稱，植基於意識型態之建構。然近代體育學術研究並未統整為其所言之意識基模(scheme)，職由，本文並未意圖以治亂對稱的模式來探討現代體育學術研究，而是切入如何串起體育學術研究，失去的聯鎖(The Missing Link)之脈絡為詮解之重點。

近代體育學術研究，究其結構為一學術複合體，因是，本文擬以史學研究法中之時間線性為經；以面性空間之體育學術研究內容為緯，結其網絡，並進而以史學研究中之斷代研究手法，擬將本文區分為：一.前言；二.1971-1976(初耕期)；三.1977-1981(建痕期)；四.1982-1986(困難期)；五.1987-1991(發展期)；六.1992--(結合期)；七.結言等章節。

本文並不打算對所思考的學術提供一完整無缺的統觀，因為每一學術內容都有太多的差異，是難以窮盡的。

二、1971-1976 之體育學術研究探討（初耕期）

人類所看見的，大部份是他們想要看的。而學術研究者則更應以高瞻遠矚的觀點(High Mained View)，對學術研究有所學盡。從 1970 年開始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學養的學術研究者後，為台灣現代體育學術研究重新開啟更寬廣視野。

延伸第一代學術研究者的途徑，1971 至 1976 年間，大致以質化研究為較多取向，並大都以所著集結成冊定教科書之用為主要研究類型。同一時期，能供以學術研究發表之體育刊物亦有限，僅有國民體育季刊（民 58.06 創刊），其餘研究成果則大都見於學位論文。另則大量翻譯國外學術研究成果作品亦出現於此時期，譯作取向以質化研究為主要選擇。各學門與研究者之間，並未確立專業分化定位，研究者視現況需求而橫跨不同專業領域作大量輻射式轉介及整理、收編工作。此時，除台灣師大外，另輔仁大學、文化學院、台灣體專、台北體專、台東師專均設有體育科系，但學術數研究成果發表則仍大量落點於台灣師大，形成此時期之體育學術研究以台灣師大一枝獨秀，並肩起帶動後續研究之風。此時之學術研究雖大都為中譯化及整編的工作，但代表的是國內學術研究界的選擇與努力，其對學術研究的啟蒙和研究工作進行上的貢獻，可說是不遑多讓。

三、1977-1981 之體育學術研究探討（建痕期）

1977 至 1981 年間，堪稱為國內體育學術研究類型建痕期。量化研究的篇幅漸增，且提供學術研究成果發表的園地亦比前期增多了體育學報（中華體育學會）；現代體育（民 67，現已停刊）；亞洲體育（民 66，現已停刊）等刊物。一般認為，1960 年代以後，國內體育學術研究始有具體表現，而於 1970 年代中期，研究發展的情形，則較為顯明。概略而言，本階段：一者因忙於培養學校師資；二者科學基礎方法及儀器的欠缺；三者有志從事體育學術

研究者為數甚少，因而研究風氣尚無法大力開展。

在此時期的研究篇數約有 135 篇，其中量化研究則比前期則較有穩定平均的研究篇幅數量(民 66.26 篇；民 67.21 篇；民 68.32 篇；民 69.22 篇；民 70.28 篇)，可知，在此時期，量化研究在國內學術中，較之前期已大為奠定。雖是後景堪以期許，但於此中也可見一屬於對應此期之特有現象，即發表學術研究成果的篇數與研究人員數呈現非對稱性(0symmetrical)的分配(10 篇以上有 2 人；5-9 篇有 13 人；3-4 篇有 6 人；2 篇有 20 人；1 篇有 77 人，以上資料上溯至 1971)，依此發表的人數來看，則約佔當時大專院校體育專業人員 1/5 弱而已。

在此時期的研究內涵，則明顯驗證體育是教育的一環之說，而形成一「次學術(sub-academic)」的現象。學術研究對於研究者而言，也都以「為研究而研究」、「為發表而發表」為表現向性。但在人通過自然理性想像出來的東西，與那受啟發了的人通過沉思所見的東西之間，是有無以比較的距離的。藉學術研究舒陳研究者的思考空間，則是為後期研究埋下隱憂。

四、1982-1986 之體育學術研究探討（困難期）

體育學術研究，在於體育專業人員平時從事體育理論與實際的鑽研成果，藉之促進體育的迅速發展。體育學術研究成果的推展在於專利之發行，才能普及國內體育學術。於 1982 至 1986 年間，「中華體育」(民 74，中華民國體育學會)創刊，提供研究者有更多的成果發表空間。而此時期，體育學術研究者大都戮力於方法論的開發，亦即發現事實的方法與確定法則的方法二者間的關係。就科學的思想方法，本是用以思考無生命的自然，然而人文思想，卻是一種對生物—事實上是對人類研究，因此，我們何以竟能認定，科學的思想方法，必定可以應用於人文思想研究之中？由是，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七年間，國內體育學術可謂經歷了湯恩比(Arnold J. Toynbee, 1889-1975)所言之困難期。

在此時期，學術研究者於發表的量上而言，似乎大幅萎縮（約 102 篇）；於質上而言，研究者亦都延承自身研究軸性的面上，並未有深度化現象產生。而尋其原由，大都限於師資不足，而於方法論上，則有嘗試新研究法的企圖，但同時，卻並未以「歸謬法(reduction ad absurdum)」來加以檢測舊有研究方法論之適切性。可以如此說，一個學術研究的本身，是研究者與研究主體之間的關係系統，若沒有這樣一種關係系統，則學術研究根本無法存有。因此，在處於困難期的同時，各體育學術類科研究上，並無法形成「疊合(Coincidence)」情景，導使研究成果滯礙難行。

於此時期，由體育學報上發表之研究成果的量，可知減量的趨勢（如：運動生物力學 4 篇；體育三哲學，13 篇），其他新興類科則尚未開發（如：運動管理、運動行銷等），介此青黃不接時期，原因之一，可推論是許多前研究者出國進修，吸汲更多之研究方法論及領域。

五、1987-1991 之體育學術研究探討（發展期）

1987-1991 年止，可謂台灣育學術量化研究之蓬勃發展期。發表園地亦增加了國立體育學院叢論一刊(民 78)；大專體育(1-5 期，民 80)；台灣省學校體育(1-5 期，民 80)等。期間，國立體育學院之設立(民 76)；出國進修之學人亦魚雁歸國，加入研究行列，為體育學術研究注入新血。此間，各刊物之規畫亦見雛型，大致上均以：(一)人文科學；(二)自然科學為分類重點。至 1990 由體育學報(第 9 輯，民 79)始，分類上有較多增設，如(一)人文科學；社會、行為科學；自然科學；運動技術分析。而中華體育於此時期亦擴為季刊(民 77.9)。究其原因，體育學術研究人員的大量投入，嘗試不同性質之研究應是主因，致使原有之分類無法切適研究主體，另大量研究發表，亦促使發表成果園地之需求也大量增加。

一個學者可以根據其學術素養與實際經驗，關照整個社會的歷史發展脈絡，指定某些有意義，而他本人有興趣的現象，有意地選擇一些變項因素來加以探討。此即偉伯(Weber)所提「選擇性的親近(effective affinity)」，依此選擇性可清楚看到於此時間，量化研究佔全部研究之大宗(佔 87%)，而同時，質化研究與前期比對，成長篇幅則大不如前。但統觀此時期的研究主題素材(subject matter)是以量化研究為主要，其中尤以運動生理醫學(25%)、運動教練學(38%)所佔比率最高，相對地，質化研究的篇幅則僅佔 6% (運動社會學科 3%；體育史哲 3%，以上含升等論文在內)。但依此研究的票面價值(face value)來看，國內體育學術研究於此時期講的主要是事實，卻不一定是意義。觀察此時期的質化研究現象，則仍有可喜之處，雖篇幅較量化研究少，但其系統性研究則大致建立，研究者對於主體素材上的承接，已建構一學門之模型，此應是此時期間，國內體育學術研究上的一大躍進。

六、1991--- 之體育學術研究探討 (結合期)

自 1991 至現在(至 1998)，這七年期間是為萌芽結合期，國內體育學術研究的質與量均大幅提昇。從量上看，運動心理學類科超過 180 篇，為前期兩倍強(1977-1981 約 65 篇)；運動生物力學類科亦增為 102 篇(前期約 59 篇)；運動社會學類科為 53 篇(前期 21 篇)；體育史哲也擴整為 53 篇(前期 19 篇)；運動生理醫學類科則為 158 篇，與前期 144 篇比較，成長不大；運動管理學類科為 57 篇(前期 17 篇)；運動教練學類科則仍是相當受到研究者喜愛的研究主體，有 391 篇(前期 224 篇)。在這時期的研究，從質上看，可能因為研究的環境、設備器材漸趨成熟。因此，研究者從事研究過程，已有較為深入及細微化研究的趨勢。而質化與量化研究的比率，至此時期，大致已呈平衡分佈(運動心理學佔 17%；運動生物力學佔 10%；運動社會學佔 5%；體育史哲學

佔 5% ; 運動生理醫學佔 15% ; 運動管理學佔 5% ; 運動教育學佔 5% ; 運動教練學佔 37% ; 總篇數約計為 1051 篇)。但於研就人員上看, 質化與量化研究人員似乎呈現不同分佈。質化研究人員大都為以博、碩士班在學生居多; 而量化研究人員則以在職為多(升等論文)。

同期, 原台北體專、台灣體專同時升格為台北體育學院、台灣體育學院; 文化大學則成立教練研究所(民 83), 國立台北師院(民 82), 屏東師院(民 82)亦成立體育系。至此, 原提供學術發表刊物也紛紛重整、改版、擴編(如北體學報、國立台灣體育學報等)。惟至此期, 國內學術研究從文化大學成立國術組至今(民 72), 並未見此相關主體素材之大量出現, 致使國內學術研究大都偏於西方運動項目為是, 這應是同期之一小缺憾。但於質化研究上——尤以體育史學類科面, 根據推測, 可能與 1949 年之後台灣的政治型態之轉變以及本土意識之抬頭影響有關, 而促使從事此研究主體面上有逐年增加之勢。

當代體育學術研究至 1991 年起, 另一可觀現象是: 體育運動學術學門的釐清與整合。隨著國家、社會、經濟的發展, 體育學術也逐步拓展其自身的範疇, 人文、社會、自然等學門兼容並蓄, 而教育學術再也無法涵蓋這麼龐大的運動文化體系, 且有逐漸脫離教育學術而獨立發展的軌跡。

七、結語

誕生只是孤立的動作; 而成長卻是連續的過程。如果每一項成功的回應, 都能激出一項不平衡的情狀, 而每一項不平衡的情狀, 以需要新的創造來加以調節, 若此, 則國內體育學術研究就能成為一種自足自續的系列, 一直維持下去。綜觀國內現代體育學術研究, 從「單軌圖形」研究方式至「多線圖形」的研究向性, 可謂華路藍縷之途, 但學術研究世界是一座橋, 僅能走過去, 不應妄想在其上蓋房子。因為一個志在評估在某一時期或某一地

域，影響人類心智的學門，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機會了。長達二十多年的體育學術研究路程中，所表現的各個形象，其實只是表面的象，這現象掩蓋了基本的一致性，卻又無損於基本的一致性，則我們將有輕重倒置的危險了。

綜合而言，國際先進國家之體育學術研究，真正具備研究體系，以及著有成績表現者，為時不過半個世紀。以中華民國之條件言，目前仍處開發狀態，自不能凌駕強林之上，但咸信，只要假以時日，當可有長足的進展。而體育學術研究這二十多年來，於質化及量化研究之間，一直處於表象的良性競賽上，也持續演出「退離與復返 (Withdrawal and Return)」的雙重運動。因而，質化研究的量化問題；量化研究的質性深度化，都將是開啟的新門徑 (Door-way)。

參考文獻

1. 國內體育學術研究現況 吳鎮安 2010 體育白皮書 1999
2. 意識型態的探索者 Mannheim 允晨出版社 1982.11 高雄
3. 歷史研究 (上)(下) 陳曉林譯 遠流出版社 1987.11